

北京国际图联大会论文选集

(第六十二届 IFLA)

海淀区教育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十月

前 言

国际图联第 62 届大会于 96 年 8 月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大会是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与会各国代表就图书馆的发展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进步的作用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交流了各国图书馆工作的经验。面对世界信息与信息载体的迅速发展,各国代表就图书馆所履行社会职能的变化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海淀区教委十分重视这次大会召开,经国家教委、北京市教委批准,派出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众多的交流论文中挑选 9 篇中国代表的优秀论文编辑成集,目的是希望通过此论文集使没有参加本次大会的同行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了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树立紧迫感、时代感,使我们的图书馆工作逐步与世界接轨。

在编辑此论文集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不免会有一些疏漏,请批评指正。

海淀教委中教办 装备部

目 录

1. 面向多元一体化世界新格局的图书馆	1
2. 中国中小学图书馆:历史、现状与未来	10
3. 未来的中国图书馆员及其培养	28
4. 资源共享(UAP)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人类 发展的迫切要求	43
5. 改进少年儿童阅读指导工作的思考	49
6. 中国儿童图书馆事业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56
7.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70
8. 关于发展中国乡村图书馆事业的思考	77
9. 她们,撑起图书馆事业“半边天” ——中国女性图书馆员的现状与未来	85

面向多元一体化世界新格局的图书馆

费孝通

国际图联,即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是世界图书馆界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专业学术组织。今年第62届大会是国际图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年会,这无疑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一件大事。而我本人有幸应邀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更使我感到莫大的荣耀。我仅向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和全体代表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大会的主题是,“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我认为,它顺应了我们时代的主流——全球普遍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抓住了当代图书馆的主题——如何使图书馆更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因而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深刻的理论性。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基本社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对图书馆与经济的关系,无论是从个人成长的经历,还是从学术成就的经验看,都有许多深刻的感受。首先请允许我从自身感受谈谈图书馆的作用,然后阐述我对处于世纪之交的图书馆的展望。

一、从小书斋到大图书馆

八十六年前,我出生在中国江苏省吴江县一个小镇里。我的家庭历代依靠科举制度取得高低不等的功名,也就是相当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识字来谋生的那一种社会阶层。到我父亲成长时,科举制度取消了,他即改行从事地方教育工作。苏南地区这种知识分

子家庭较多、他们家里大多建有一个书斋用来培养子弟。这种书斋就是中国历代相当普遍的民间图书馆，规模有大有小。一般都藏有中国基本经典著作，《四书》、《五经》等和文献古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古今图书集成》等，到民国初年还包含有当时已经开始流行的报章杂志的通俗刊物以及介绍近代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书籍。但是即便在当时文化较发达的太湖流域，到了民国初年，地方上还没有见过公共图书馆，提供市民自学的设施。这使我在早年除了在学校教室里学习基本知识外唯有通过家里的小书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及简单的当代世界知识。这种书斋式的民间图书馆事实上长期维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培育了大量优秀的中国历代文化人才。但这种封闭在少数人家的书斋也是中国过去文化发展较慢，知识传播面狭小，知识分子数量少的一个客观原因。我自己就感觉到由于早年与图书馆接触少，知识信息迟钝，使我一生的学术基础不够结实，知识面不够广阔。家里没有书斋的子弟知识发育上所受的限制那就更大了。

三十年代，我先后进入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我的学生生活中最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大学里有藏书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我好比是从小书斋这个笼子里放出来进入了广阔的天地。凡是教室里听不到的知识，可以自由地任意采撷。有时有一种进入了百花园里的蜜蜂，忙乱得不知所择的感觉。特别是我初到伦敦经济学院念书时，在开架的图书馆里，我可以自由地不经什么手续取阅架上任何我想翻阅的书，我竟成了饥不择食的来客。不到闭馆时间，我终日可以不离座位。这是一种一生难得的享受，正如在知识海洋里自由游泳，其乐无穷。就在这种愉快的心情下，我写出《江村经济》一书，我的第

一本著作。

好事难常，美景恨短。当我在伦敦完成学业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的祖国正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苦卓绝的抗战。我匆匆离开伦敦，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到后方云南省昆明市的云南大学任教。我虽则在抗战的大后方的内地农村里还可以继续投身于社会调查，继续我的学术研究，但是当时从沦陷区搬到后方的大学，一般虽有图书馆设备，但藏书不多，尤其缺乏国外新出版的书籍、杂志、学术消息几乎处于一种完全被封锁的状态。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清华大学为了充实搬迁到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曾企图把北京原藏的书籍运往内地，但不幸运书的油轮被日本炸沉在长江里。莘莘学子在精神粮食上受到的打击是惨重的。

以我个人来说，由于国际学术交流的匮乏，不仅直接影响到我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形成我一种偏多独立思考而较少对别人的思想进行分析、比较、交流、探讨的风格，这使我在学术上处于闭塞状态。解放后，我国长期受到国际封锁，加上我个人的政治处境，使我很难同世界学术界的新思想、新观点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这自然阻碍了我在学术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这一状况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逐步得到改变，我开始又重新接通国际学术信息的渠道，使我恢复了学术生命，这也就说明了如果没有图书馆这样供应知识信息的服务机构，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无法维持的。从我的治学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图书馆对于教育与科学，发展与进步，确实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宝库。

二、经济振兴和民间图书馆的崛起

我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于三十年代中期，是从农村调查开始的。无

论是在中国东部的江苏吴江鱼米之乡，还是在中国南部的广西大瑶山山村，从我的亲身所见所闻，触目惊心的是：广大农民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陷入食不裹腹的极端贫困的境地，这使我得到一种认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问题，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由此产生了用一切努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为我日后毕生“立志富民”的志愿打下基础。我这一生的学术工作也只能说是这个志愿的实践。

到了四十年代，我通过调查研究，提出“现代工业技术下乡”和建立“乡土工业”的论点。我认为，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农村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图强，城市要到农村去办工业才能减轻工业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中国应当在“农工相辅”、“城乡结合”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达到城乡现代化。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可行之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入独立自主的时期。我曾为之兴奋不已。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设没有能走上顺利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广大农民到了七十年代尚未能摆脱穷困状态。经过四十余年的徘徊，我国政府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短短几年里我国农村以至全国面貌发生大变。1981年我在我熟悉的江村，惊喜地看到，仅仅三年，大大地变了样，人均收入从1977年的114元增加到300元，名列全国前茅。事实就在眼前：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业办起来了，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结合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我三十年代所提倡的思想和见解受到社会 and 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得到了实现。八十年代以来，我不断走访中国各地的乡镇。所到之处，无不被乡镇企业的蓬勃

发展所鼓舞。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中国的工业化要在农业基础上发生和发展，推动农业进一步繁荣，农工并进，走向现代化。

在我的社会经济系列调查中，一直注意到有一种现象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农村文化的发展，农民迫切需要知识和文化。为了搞好科学种田，他们需要科学知识；为了搞好经营，他们需要市场知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他们要求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经济开始繁荣的农村，必须与文盲、不文明等落后现象作斗争。那些乡镇经济发达的地区，无不致力于教育和文化的建设，一是办学校，二是办图书馆。乡镇图书馆、农村阅览室、乃至农民个人图书馆，越办越红火。例如，苏州、无锡、吴江、张家港等地就是这样。无锡实现了村村有图书馆，每馆藏书平均超过万册。常州市图书馆藏书 100 万册，率先进入人均藏书超 1 册。在珠江三角洲，例如深圳一个村子，一次投资 80 万元，建立了一座拥有几万册藏书的图书馆。这方面的数字不胜枚举。

中国有 12 亿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全国有 5 万个乡镇，有 60 多万个村庄。乡镇的农村图书馆的崛起，前途无量。它必将大大加强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步伐，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我这一生，几乎纵贯二十世纪，在中国看到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化过渡的主要过程。如果单从个人的阅历来描写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从少数士绅的私家书斋向广大乡村民间图书馆的转变，从被少数人垄断的知识领域走向普及全民群众共享的知识信息系统的建立。这个转变和发展也描画出了中国今后的社会文化趋向。

三、图书馆在世界新格局中的使命

说到这里，我们的视野不妨从我个人和乡镇扩大到全中国，进而

展望正在迈入 21 世纪的全世界。目前,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不仅发达国家大大发展了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也在致力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在进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正满怀信心地深入改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商品交换,一个商品通过交换可以不受地区和国界的限制,走向全世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得世界各地、各国家之间利害相连,休戚与共,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世界逐步、逐步地走向“一体化”。正象人们所形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全球将变成一个巨大的村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为世界一体化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世界经济的日益密切,不仅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相关的意识,也增强了个人的自我意识,民族的自主意识,国家的民主意识,加之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存在着国家、民族、个人的巨大差异,表现为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它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共生共长的。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深受历史继承性的影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强化了多元化的存在和发展,使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必然会呈现出文化多样化的绚丽色彩。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只有各个民族国家的充分发展,才能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也才有利于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世界文化多元化又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发展的,因为经济一体化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创造了条件,推动各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有助于世界文化多元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的社会的进步。偏重一方、否定一方都不利于世界发展。

一体化和多元化相辅相成,要求各种经济和文化在发展中相互交往,应当相通而不应当相撞。既然经济一体化是客观发展的要求,为什么不同的文化就不能相互沟通呢?中国人从自身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即中华文化史中有着深刻的体会。

中华民族有 5000 余年历史。它最早源于黄河流域,称为中国或是华夏,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溶合了多民族,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并将其影响扩展至东亚、东南亚、欧洲以至全世界。目前,56 个民族和睦相处,各展宏图,共同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这样一种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它具有东方文明的特点,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固然有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的作用,而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显然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中国人一贯十分重视知识和信息的作用,重视文字、图书、造纸、印刷、图书馆的作用。3000 多年前中国的先民创造了文字,2000 多年前秦代大陆上的居民已具有可以相会意的共同文字,即史书上所说的“书同文”,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上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网;1800 多年前蔡伦发明造纸术;1300 多年前唐代出现雕版印刷;800 多年前宋代毕升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从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图书成为最有效的信息载体,大大沟通了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理解,促进了多元一体化的进程,共创中华文化的辉煌。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如此众多的人口中,能在基本思想、基本生活方式上取得共识,在行动上得以协调,没有一个能共同理解的信息系统是不可思议的。

展望 21 世纪,世界将在多元一体化中求生存、得发展。要做到这

一点,关键是要通过包括更多元的文化间的信息的传播和交流,用以消除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而产生的隔膜和矛盾。当今,在观念形态上,无论是人权观、妇女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观点,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表明相互之间缺乏了解。由于各自的发展历史不同,国情不同,对各种问题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墨守一种模式,更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增强理解和宽容,使居住在同一地球上的亿万居民能够相互理解、会意和同情。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更有效地发挥信息的交流作用,有赖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以适应当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迫切需要。

图书馆是人类自古就发明的积聚知识的宝库,是传播和交流知识和信息中心,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处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传统法宝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已成为人类和平共处和发展进步的迫切需要,同时也看到这种需要因当前科技发展而逐步得到实现。

图书馆正面临重大变革。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以及计算机国际语言化技术的突破,正在把传统的分离割裂的图书馆推向全球一体化、网络化的新境地。图书馆将真正摆脱地理环境的制约,成为世界性“大图书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用户将成为世界所有图书馆的用户。中国的图书馆、包括乡镇和农户里正在蓬勃发展的民间图书馆必将成为世界大图书馆网络中的节点。全球的信息资源将会及时、准确、方便地为公众所共享,人们不必再亲临图书馆,只要在工作地点或在家里就可通过电脑查询到所需信息;可以浏览文字信息,也可浏览声音与图像的多媒体信息。总

之,现代化的图书馆将大大扩展人们访求信息的能力,改变人们使用信息的方式,增强人们对科技知识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加快人们在社会中的学习速度。

我们看到图书馆事业的光辉前景,但真正达到这个前景还要经历一段艰苦和复杂的路程。在路途中还会遇到种种困难,需逐个加以解决,有许多工作要逐步来做。我想,全世界图书馆工作者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工作是,如何搞好信息资源的组织、整理、加工与建库的工作,这是信息服务工作的根本。现代化的手段是可以买来的,但各国图书馆所特有的信息资源只有靠各图书馆自己的努力才能将其数字化、电子化。也就是说,图书馆工作者如何针对读者的需求,把网络上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信息及时加以梳理,提供给使用者,又如何把过去非电子形式的馆藏文献有计划地加工成数字式的信息,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这样做自然要涉及资金问题、版权保护问题、标准化问题等等,我深信与会者会比我有更多的思考。总之,面向未来,图书馆仍是大有可为的。只要有所作为,就会有其地位;只要有其地位,就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只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就一定会加快图书馆的发展。

图书馆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守护者,又是人类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是为世界人民提供知识和信息的服务者,又是为不断发展和丰富人类文明而辛勤服务的劳动者。让我们树立为创造一个和平共处、各得其所的全球性社会而奋斗的雄心大志,并为完成这项神圣使命而相互督促相互勉励。

我再一次热烈祝贺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中国中小学图书馆: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图书馆馆员 贾晓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馆员,主任 杜云祥

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馆长 司爱勤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图书馆助理馆员 张小燕

1、发展历史

中小学图书馆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中小学图书馆的发展大体经历了6个阶段:改造阶段、全面建设阶段、遭到破坏阶段、恢复调整阶段、改革创新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

1.1 改造阶段(1949年至1953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陆续接管了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各级中小学图书馆并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对这些图书馆进行了大力改造;确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办馆原则,调整了藏书成分,补充了许多革命书籍和新知识读物,剔除了原有的一些反动书籍,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不科学的服务措施,整顿了干部队伍,补充了新的专业人员,并建立了一批新的图书馆。当时各馆馆舍都比较小,藏书比较少,设备也比较简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有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热情很高,各馆都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一些图书外借和阅览服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各地中小学图书馆都相继完成了办馆思想和办馆方向的改造,开始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新中国中小学图书馆的雏型。

1.2 全面建设阶段(1954年至1965年)

从1954年开始,中国中小学图书馆在完成了彻底改造的基础上进入了全面建设的阶段。1956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政府组织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通过了《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奋斗》的报告;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62年12月,国家科委和文化部拟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图书部分)草案;1956年,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关于指导中小学生学习少年儿童读物的指示》,要求各学校为中小学生学习提供更多的阅读场所,引导他们多读书、读好书,等等。大中城市的中小学有半数以上建立了图书馆,在一些小城镇、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也建立了一些新馆。各馆藏书大幅度增加,都比较重视图书分类、编目等基础业务工作,并能坚持开展图书外借、阅览服务。各地主管部门比较重视人员培训工作,开办了一系列图书馆管理业余学校和培训班,培训在职人员,充实专业队伍。此外,在一些大中城市,公共图书馆还组织建立了一些包括中小学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协作网络。经过十几年努力,全国中小学建馆数量和各馆藏书数量都大幅度增加,读者工作充满活力。

1.3 遭到破坏阶段(1966年至1976年)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中国中小学图书馆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绝大多数图书馆被迫关闭,设备遭到严重毁坏,书刊资料有些被偷,有些被抢,有些被烧毁,有些丢失,损失惨重;新书采购、图书分类编目工作基本停止;许多专业人员遭到打击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管理上一片混乱,工作人员不敢坚持处罚赔偿制度,

图书外借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读者往往只借不还;人员培训工作完全停止,干部队伍遭到严重破坏。1966至1976这十年,是中国中小学图书馆事业停滞不前和倒退的十年。

1.4 恢复调整阶段(1977年至1979年)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中小学图书馆开始拨乱反正,调整专业人员,充实干部队伍,修订规章制度,清理藏书,全面整顿,逐步恢复正常的业务工作。在这个阶段,中央至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制订了许多有利于恢复和促进中小学图书馆的政策和措施。经过三年多的调整整顿,中国中小学图书馆基本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在一些大中城市还出现了新的协作网络,如:郑州市的“中学图书馆中心协作组”,杭州市和青岛市的“中学图书馆协作网”,厦门市的“中等学校图书馆协作组”等等。

1.5 改革创新阶段(1980年至1992年)

1980年至1992年,是中国中小学图书馆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图书馆发展的新措施。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决定在文化部设立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1981年5月,文化部、教育部和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座谈会,通过了《关于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要求各地加强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增辟阅览室,制定专门的图书经费预算;1982年11月,国家“六五”计划中提出了加强图书馆建设的具体要求;1985年7月,宣传部和文化部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1989年1月,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了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工作会议,成立了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协会筹备组;1991年5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儿童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版)》正式出版,8月,国家教委颁布了具有法规性质的《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明确了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随后,各省市又根据本地特点,颁布了一些地方性法规。由于决策科学,措施得力,中国中小学图书馆得到了迅速发展,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b. 各馆规模有所发展,办馆条件得到改善,藏书大幅度增加。

在这个阶段,全国中小学图书馆的数量进一步增加。根据国家教委对北京、成都、上海、常德、常州、杭州、徐州等地抽样调查:1987年,大中城市中学设有图书馆的占70%,各馆平均藏书1.35万册,管理人员2.5人;小学设有图书馆(室)的占40%,各馆平均藏书3100册,管理人员0.5人。以北京市和南昌市为例,在这12年间,北京市840所中学图书馆藏书总量增加70.4%,3375所小学图书馆藏书总量增加87.7%;1989年,南昌市37所中学图书馆的藏书总数达53万册,比1979年增长191%,馆舍总面积达4423平方米,是1979年的2.5倍,管理干部达91人,是1979年的2.1倍,办馆条件明显改善。其它省市如湖南、四川、江苏、辽宁、河南、江西、天津、上海等地,情况也大体如此。

c. 业务工作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开展。

在这十几年中,各馆在内部管理、基础工作、服务方式、服务质量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改进,如制定和完善工作制度、整顿藏书和目录、变闭架借阅为开架借阅、延长开馆时间等等。各馆积极配合学校教学,主动为师生提供教学参考资料,组织学生参加课外阅读活动。有

些馆还为学生开设了阅读指导课,编制了推荐书目,帮助学生掌握利用图书馆知识,提高自学能力,读者工作生机勃勃。

d. 地区性协作网络得到了较快发展。

在这个阶段,各地中小学图书馆之间的协作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九十年代初期,全国已有南昌、徐州、杭州、天津、厦门、郑州等数十个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中小学图书馆协作网络。

1.6 稳步发展阶段(1993年以后)

从1993年开始,中国中小学图书馆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各馆根据《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的要求,积极更新设备,补充藏书;完善规章制度,实行科学管理;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充实干部队伍;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服务质量;规范基础工作,促进现代化建设;加强馆际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取得了许多新的进步和成绩,并逐渐向标准化、规范化、网络化和现代化迈进。

2、现状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中小学图书馆事业已基本形成体系,初具规模。全国100多万所各类型中小学大部分已建立了图书馆(室),配有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有一定的购书经费,有基本的设备设施,有较完善的规章制度,普遍开展了图书外借、阅览等服务工作,对各个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教研工作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在经济比较发达、教育基础较好的城镇和农村,还形成了许多地区性的图书馆协作网络,各地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诸如联合编目、馆际互借、协调采购等多种形式的资源共享活动,并开始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对图书资料进行分类、编目和排架,实行科学管理。一些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在坚持外借、阅览服务的基础上还开展了阅读辅导、参考咨询、